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明清文化史探研

谢贵安 著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文化史探研/谢贵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002-7

I. 明… II. 谢…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400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明清文化史探研

谢贵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7002-7

2010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8¹/₈

定价: 46.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普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 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

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2 月

前 言

本论文集是笔者从事明清文化史研究的心得和结晶,就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有关明朝皇帝问题的研究,重点是对太祖朱元璋的心理、思想、政策以及因他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探讨,包括《朱元璋的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和《明代〈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三篇论文;另有一篇《论明代儒臣与宦官在皇帝娱乐中的影响和较量》探讨了明代外朝官与内朝官对皇帝争夺的过程及背景。

第二,有关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物质文明成果传入中国之历程的研究,包括《利玛窦“送礼”初探》《明代西器东传探研》《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西器东传与清代前期社会》四篇论文;另有《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一篇,通过西方诸国汉译国名的演变来探讨国人对西方列强认知态度的转变。

第三,有关明清文化转型的研究,包括《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四篇论文;其中所谈论的“新民本”思想,是明末清初政治思想在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时代新貌。

第四,有关明清文献和史籍的研究,重点是对明清实录修纂措施、内容及版本的研究,包括《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清实录》宫藏版本考》四篇,另有《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一篇,是对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山东巡抚洪朝选的文集所作的研究。

本书的编排结构,既考虑到内容的同类性,又兼顾到时代顺序,可以说是纵横结合的结果。

朱元璋的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

明太祖朱元璋对汉高祖刘邦的崇拜情结,前人曾有注意^①,但系统论述的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爬梳《明实录》以及《明史》等基本文献,对朱元璋之于刘邦的崇拜心理及其对明初政策走向的影响,作一详细的论述。

一、从朱元璋偏爱《汉书》看他对刘邦的崇拜

明太祖朱元璋喜欢读史论史,所读的主要是正史,如《史记》《汉书》《晋书》《唐书》《宋史》《元史》以及《春秋》《资治通鉴》《唐太宗帝范》等。他读得最多的是《汉书》,据笔者目力所及《明太祖实录》直接记录的就达8次,与臣下讨论汉史的则有41次之多。朱元璋读《汉书》的时间很长,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一直到洪武末年,可谓活到老,读到老。他不仅自己读,还把它推荐给臣下。当元朝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郭云被擒后,朱元璋“观其状貌奇伟,命释之。时方阅《汉书》问之曰:‘当识字乎?’曰:‘识。’遂以书使之读。云诵其书甚习。上大喜。遂任郭云为卫指

^①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2“明祖行事多仿汉高”(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及姜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等曾有关注。

挥金事”^①。可见朱元璋对《汉书》是爱不释手,并将己之所好,施之于人。

为什么朱元璋爱读《汉书》论汉史呢?显然有其隐衷。他的祖籍濠州与刘邦出生地沛县相隔不远;两人的发迹经历也大体相同,正如他的谏议大夫唐铎所指出的那样:“三代以后,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②两人的文化素养都不高,造反前都缺乏政治实践,刘邦在群雄争夺的乱世之中能夺取天下,并把汉朝治理得很好,无疑对朱元璋形成了强烈的吸引。朱元璋不仅效法这位前辈,甚至对他产生了偶像崇拜的心理。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卷32“明祖行事多仿汉高”中点破了朱氏的这种心理倾向:“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③“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表明朱元璋是将刘邦装在心里,当作偶像来崇拜的。

基于这种崇拜心理,朱元璋对刘邦十分钦佩,反复赞美,并为之辩护。一次罢朝后,退临白虎殿看《汉书》,问侍臣宋濂和孔克仁道:“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答道:“王霸之道杂故也。”他问:“咎将谁属?”克仁对曰:“责在高祖。”朱元璋立刻为心中的偶像辩解:“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④朱元璋认为,汉代礼乐未复三代之盛的责任在汉文帝而不在刘邦。又一

①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洪武元年四月壬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明太祖实录》卷153,洪武十六年三月庚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

③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32,第737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15,甲辰五月丙子;又《明史·孔克仁传》。

次，朱元璋与侍臣谈论刘邦听张良之言销毁六国印的事，称赞道：“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举出唐太宗来与刘邦相比，朱元璋立刻反驳道：“太宗常有自矜自怨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① 朱元璋对刘邦的评价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洪武七年，他亲祀历代帝王于新庙时，献给刘邦的祭文是：“惟汉高祖皇帝，除嬴平项，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② 不仅对刘邦的业绩十分崇敬，对刘邦的相貌也非常追慕。洪武元年七月戊辰，他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至刘邦时“展玩再三，谛视久之”^③。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由于朱元璋崇拜刘邦，所以他常以刘邦自比。这从当时将大臣一一对号入座，比作汉初文臣武将的风尚中可以得到旁证。在封大臣汪广洋、刘基时，把他们比作张良。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言刘基宜配享高庙，当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下廷臣议时，皆言：“高帝收揽贤豪，一时佐命功臣并轨宣猷，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往往属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诸葛之喻。”^④ 子房便是张良，反映在朱元璋的军队里刘基是被视为张良的。封李善长时，朱元璋把他比作萧何，“制词比作萧何，褒称甚至”^⑤。当朱元璋亲信僧人，疏离大臣时，给事中陈汶辉上疏劝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缙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缙流俭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

① 《明太祖实录》卷 210，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己卯朔。

② 《明太祖实录》卷 92，洪武七年八月甲午朔。

③ 《明太祖实录》卷 33，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

④ 《明史·刘基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下同。

⑤ 《明史·李善长传》。

彦，则太平可立致矣。”^①显然，当时的人是将刘基、李善长、徐达、周德兴等人视作汉初的萧何、韩信，可见朱元璋时代有以汉初君臣自比的风尚。既然李善长是明代的萧何，刘基是明代的张良，徐达是明代的韩信，那么朱元璋自然是明代的刘邦了。《明史》的作者已发现了朱元璋自比刘邦的内心隐秘：“太祖以汉高自期。”^②朱元璋曾对孔克仁讲：“秦政暴虐，汉高帝起布衣，以宽大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③言下之意，只有自己才能像刘邦那样成就大业。《明史·太祖本纪赞》也以朱比刘，云：“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意思是说，朱元璋的功业只有刘邦才能相比。

一些臣子也窥知朱元璋崇拜刘邦的心理。当朱元璋问李善长四方混乱何时能定时，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五载成帝业。今元政不纲，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④朱元璋听后连连称善。李善长显然是投其所好。另一次，当朱元璋问侍臣王祯、魏观，汉高祖与唐太宗谁优时，魏观就顺其意道：“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矫揉；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宏远。以此观之，高祖为优。”^⑤大臣们对刘邦的推崇，折射出朱元璋对刘邦的崇拜。

朱元璋对刘邦情有独钟，而对其他汉帝则少有肯定。他认为文帝用人“未尽其道”，“非所以示至公”，指责他不能乘势兴礼乐，“有其

①《明史·李仕鲁传》

②《明史·孔克仁传》

③ 同上。

④（清）夏燮《明通鉴》前编卷1，至正十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明太祖实录》卷21，丙午年九月乙巳。

时而不为”；^①批评景帝当太子时滥杀吴王世子，继位后又听信晁错之言削藩；抨击武帝在国库之外另立私库，“损民以益君”^②；斥责元帝“无刚明果断”，致使“政日弊，国日衰”^③。对于东汉诸帝，除刘秀外，朱元璋也多加抨击。如认为明帝无兼听之德，“未免苛察”^④。

由上可见，朱元璋对刘邦比较偏爱，把他当作偶像加以崇拜。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曾指出：“对一个英雄的崇拜就是对一个伟人的超验的敬慕”，“除了这种对一个比他更高尚的人的敬慕外，一个人的胸中没有别的比这更高贵的感情。在这个时刻，在所有时刻，它都活跃地影响着人的整个一生”。^⑤朱元璋对刘邦的偶像崇拜，确实影响着他的一生及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

二、从朱元璋的政策看其受刘邦的影响

朱元璋对刘邦的崇拜，影响到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赵翼就明确指出“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明祖……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⑥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73，洪武十八年六月庚戌；卷 15，甲辰年五月丙子。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27，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③ 《明太祖实录》卷 213，洪武二十四年十月甲寅朔。

④ 《明太祖实录》卷 172，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⑤ [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8 页。

⑥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 32，第 737 页。

当天下未定之时,朱元璋就采取了刘邦“相势而动”的策略。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四月,他在与孔克仁谈论刘邦“起自徒步,终为万乘”时,分析道:“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作,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罟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劲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① 朱元璋称赞刘邦的待势而行,相机而动,并主动采取了这种有效的策略。又有一次,在读《汉书》后谈体会道:“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皆过也。”^② 对刘邦相势而行策略的认同,是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③ 计策的思想基础。

天下初定后,朱元璋又采取了刘邦“与民休息”的政策。汉初,天下甫定,四方凋敝,为了恢复国力,刘邦实行了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政策,结果获得成功,导致“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朱元璋追慕刘氏,也实行了“息民”的方针。洪武二年三月丙午,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等说:“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祸极矣。天道厌乱,人心思治。今疆宇虽定,然中原不胜凋弊,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时可以休息也!”并指出:“今民之思治甚于寒之思温,热之思凉,正当有以济之。”^④ 又一次,他与大臣刘基讨论“息民”政策时,说:“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刘基答道:“生息之道,在于宽仁。”他说:“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民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6,乙巳年四月庚子。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5,甲辰年五月丙子。

③ 《明史·朱升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 40,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以遂其生。”^①于是，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息民措施，如奖励垦荒，实行屯田，严敕官吏不得扰民，惩治奸贪，尽量不大兴土木。结果至洪武末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 400 万顷，比元末增加了一倍以上。

朱元璋还模仿刘邦的宏宫室及实京师的政策。汉初，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②朱元璋“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③。刘邦为了巩固政权，还将大量富民迁移到长安及关中，以固根本。朱元璋也起而效法，迁富民于应天（南京）。洪武二十四年，谕工部臣道：‘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屋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 5300 户。”^④后又徙浙江等九布政司及应天十八府州田满七顷以上的富民 14300 户至京师。除徙富民京师（今南京）外，还迁富民于中都凤阳。赵翼指出朱元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⑤。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还模仿刘邦的举措，大杀功臣。赵翼就明确指出：‘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今菹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矣。’^⑥刘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铲除异姓王的行动。昔日为

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14“开国规模”，洪武元年正月甲申。

②《汉书·高祖本纪下》

③（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 32，第 737 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 210，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

⑤（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 32，第 737 页。

⑥ 同上。

汉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和后继燕王卢绾等都先后被除，其中韩信、英布和彭越遭杀，其他诸侯王或废或逃。此外，边将陈豨也遭到杀害，连丞相萧何也一度被捕入狱。朱元璋十分欣赏刘邦的这一措施，为了解除功臣对明王朝的威胁，他也大开杀戒。朱元璋登基不久，下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败……汝等宜深戒之。”^①他用刘邦杀韩信、彭越的故事警告功臣，已透露出杀机。为了说明刘邦杀功臣的合理合法，朱元璋还为刘邦辩护：“朕仿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听朕言：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非高祖……忘功臣之劳，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②朱元璋对功臣的疑惧心理，因其儿子朱棣火上浇油而日益增强。太子朱标死后“燕王来朝，颇言‘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③。朱元璋杀功臣有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胡惟庸案，被杀达3万余人，一次是蓝玉案，被杀1.5万余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④。娄曾泉等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元璋这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做法，也是向刘邦学习的。”^⑤

朱元璋盲目模仿刘邦大杀功臣的行动，反映了自卑虚弱的心理。刘邦杀功臣，铲除异姓王，主要是为了防止刚刚统一的社会再度出现

① 《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② 《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

③ （清）夏燮《明通鉴》卷10，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

④ 同上。

⑤ 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第33页。

分裂局面；而朱元璋大杀功臣，却不存在功臣割据分裂的客观威胁。刘邦杀功臣，主要是杀异姓王，而曹参、陈平、王陵、周勃、周亚夫这样的功臣名将及其后代并未触动，因此当诸吕篡权和吴楚叛乱时，中央政府内仍有坚强的砥柱，粉碎了这些阴谋；而朱元璋杀功臣则不分青红皂白，像徐达、蓝玉、傅友德、冯胜这样的大将及李善长、胡惟庸、宋濂、刘基这样的宿臣，都被杀或被逐，以致中央人才出现断层。当燕王朱棣起兵叛乱时，建文朝中竟无得力帅才可与匹敌，终被推翻。

朱元璋还仿效刘邦大封同姓王的政策，分封诸子为王。赵翼就明确指出“明祖行事多仿汉高”的行为之一是：“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藩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① 刘邦生前与大臣相约：“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朱元璋对此十分欣赏，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治之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② 显然，是借鉴了刘邦的经验。

朱元璋推行刘邦的分封政策，结果使历史发生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汉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明朝则发生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两次叛乱后，诸侯王的地位都被削弱。汉代是通过“推恩令”使诸侯国支离破碎，无力反叛；明代是通过剥夺宗王兵权、财权并限制其外出而使其徒有其名。不同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以诸侯王的失败而告终，而明朝靖难之役则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结束。

在用人政策上，朱元璋也唯刘邦马首是瞻。在天下平定之前，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论用人时，指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尝观汉

①（清）赵翼著、王树校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32，第737页。

②《明太祖宝训》卷1《封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印。

高之兴，首资三杰。”^①指出刘邦善于任用萧何、韩信、张良，故能成其大业，于是决心像刘邦那样选贤举能。洪武九年五月戊午，对翰林学士宋濂等人说道：“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资贤才能独理也。秦之时，张良、陈平、韩信皆居隐约，汉高卒用以成帝业。朕初定天下，即延揽群才，相与图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岩穴，岂无超群拔众之才？欲致而用之。”^②于是，招揽了不少贤能之士，但这些人在其政权巩固之后大都遭到清洗。

在封赏功臣的制度上，朱元璋也照汉制制定。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甲戌：“上因诏翰林院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号虚实之等第，编辑为书。名曰《稽制录》御制序文，颁示功臣”^③。他常用刘邦分封功臣的事例做自己封赏的样板，谕礼臣曰：“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此不足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皆至当，可以服人。”^④雍齿是刘邦同乡，一同起兵，后叛去，旋复归刘，从战有功，但终不为刘邦喜欢。刘邦为了服人，仍封他为侯。丁公名固，是项羽将领，曾私下放走刘邦。及羽灭，他求见刘邦，但刘邦不领其情，认为他没有臣节而斩之。朱元璋对刘邦这种赏罚公正的行为表示赞赏。

在定礼制以别贵贱上，朱元璋也依照刘邦的做法。谕群臣道：“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⑤于是他也下诏制定了礼仪之制及等级之禁。曾效仿刘邦赐富民年老者爵位。赵翼指出朱元璋“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七大夫以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9，丙午年三月戊戌。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06，洪武九年五月戊午。

③ 《明太祖实录》卷 226，洪武二十六年三月。

④ 《明太祖实录》卷 135，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丙申。

⑤ 《明太祖实录》卷 55，洪武三年八月庚申。